

文学与人类学文库

付海鸿◎著

中国高校多民族
文学教育的考察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学与人类学文库

付海鸿◎著

中国高校多民族
文学教育的考察研究



• • •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高校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考察研究/付海鸿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文学与人类学文库)

ISBN 978-7-5203-1037-6

I. ①中… II. ①付… III. ①高等学校—少数民族文学—教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187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赵雪娇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276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多元文化中的文学教育

(序)

徐新建*

1896年，晚清革新人士引进了《文学兴国策》一书。该书是美国教育名家的文章汇编，原名叫 Education in Japan，照今天译法更接近的书名是“日本的教育”。但当时的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而把 education 译为“文学”，并将其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强调“非人不立，人非学不成，欲得人而以治国者，必先讲求造就人才之方也”，由此提出“造就人才之方无他，振兴文学而已矣”，理论依据是“夫文学固尽人所当自修者也”^①。

1896年是光绪二十二年，正值晚清图谋变革之际。这一年，清朝大臣李鸿章出访纽约；严复在天津完成译作《天演论》；四川大学前身——四川中西学堂据说也于该年创建。彼时正逢“西学东渐”，各种域外概念接踵涌入，与本土词汇交错并举，但相互的对应久难确

* 徐新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会长。

① 林乐知、任廷旭合译：《文学兴国策》，上海广学会，1896年印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重印本。

立。尽管如今的学界已习惯以“文学”译指 Literature，从而将其与“教育”分开，但从这两个词语在实践中的紧密关联来看，当年《文学兴国策》译者选取的“误用”或“杂糅”，却不能不说体现出另一层意义上的历史创见，那就是：以文学造就人才，为强国而振兴文学。在当时许多人眼里，一部《狂人日记》对警醒国民的功效，不知胜过多少旧式学堂。难怪就连以思想先锋著称的梁启超也会以表率姿态，发表并不那么成功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时隔多年，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及育才体制革新，各界又开始关注文学教育问题，《光明日报》和《文艺报》还组织高校文学院院长们撰文讨论，发表见解不一的看法。这时，不但历史语境与晚清相去甚远，“文学”和“教育”的含义更是发生了很大改变。由于主持社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笔者和团队成员也设立专题，从多民族关联的角度加入讨论之中。早在2014年，付海鸿就作为参与者之一，以“文学教育”为题对我进行过专访。

当时我阐释的观点大致是这样的——

以如今通行的界定来看，文学教育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关于文学的教育，一是通过文学而进行的教育。这两个意思并列存在。第一层意思是指把文学作为一个目的，作为一种知识，以教育为手段来传授；就是向社会、向民众，或者向年轻人讲授并培养有关文学的观念、方法和价值，就是把文学作为知识与技能来传授的一种教育类型。另一个层面就是把文学作为工具来传授其他相关知识、改造社会。

由此出发，我强调了文学教育的多民族意涵，关注与之相关的教育场域和方式，并分辨学校与社会两大类型。我认为严格说来，由于

研究者需求的局限，目前被谈得较多的只是汉语文学的学校教育，而忽略了浸透在民众生活之中、成为各民族共同体成员生命历程之部分的文学传承，尤其是少数民族以故事、神话、传说乃至史诗、祭辞、招魂歌等多种样态呈现的口头传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以多民族文学为题对苗族《蝴蝶妈妈》、彝族《勒俄特依》及藏、蒙、柯尔克孜民族的《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直至当代虚构与非虚构的《心灵史》《尘埃落定》等族别文学的考察关注，聚焦重点显然就不会限于审美层面的阅读鉴赏，而更将涉及关乎民族文化世代相继的教育意义。由此观察，从“十五国风”到“侗族大歌”“十二木卡姆”的千古颂唱，其展现的文化意义显然超越了表面的文学象征，透射出更为深广的生命内涵。

这样的观察说明了什么呢？答案并不神秘：与晚清以来汉民族志士借新文学之力发动对“国民性”改造一样，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及现代写作同样借助文学的教育功能，起着形塑民族人格、凝聚民族认同并使之在历史长河中代代传递的重要作用。

以上述概述为背景，就不难看出付海鸥博士专著《中国高校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考察研究》的推进和不足。学术的推进体现为把看待“文学教育”的视野引向了当代中国的多民族。尤其值得欣慰的是，海鸥以此为题，不但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及答辩，而且以子课题报告的方式，达成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的分工预期。在此期间，课题成员虽也组织过实证考察并发表了相关论文^①，但从整体上对中国多民族教育加以审视论述的，当推海鸥此书。略不足处在于讨论的范围仅限于高校而未深入民间。

^① 参见徐新建、梁昭《多民族文学的高校教育——以四川大学为个案的实证考察》，《中外文化与文论》2013年第2期。

海鸿的这本著作力图讨论两个问题：首先，在当代中国高等院校文学学科设置结构中，文学教育是否呈现了多民族性？其次，从长远影响看，高校现行的文学教育能否让参与的师生充分认识中国的多民族国情、体悟并感受“多民族中国的文学之美”？通过对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喀什大学（喀什师范学院）及俄亥俄州立大学等中外院校的对照研究，作者的结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教育中的多民族性已有很大改进，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离共和国自身应达到的目标也存在较大距离。具体而言，就是“体现在文学专业的具体设置上，各个民族的文学本来都拥有一张‘入场券’，但却因为上述诸种原因未能‘真正入席’”。因此，作者期望：

打破传统的文学观，培养一大批具有“大文学观”与“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念的、拥有不同民族身份背景的教师队伍，应是高校推行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的第一步。^①

作为海鸿论文的指导教师和第一读者，我想接续的问题是：如果认可这样的“第一步”，接下来又该如何前行？

回到本题。该怎样理解多元文化中的文学教育呢？照我的看法，文学是教育的一种，需要努力实现的是在多元中理解文学，借文学体认多元。这种努力的意义，借西哲的话来讲，意味着让所有人在交往中学会“诗意的生存”；以侗族歌师的践行观之，则是超越差别，“以歌养心”。

^① 付海鸿：《中国高校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考察研究》，收入“文学人类学文库”，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学科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28
第三节 特定问题与研究框架	41
第一章 学科建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合法性与 局限性	43
第一节 文学学科设置：在“国家”与“民族”之间	43
第二节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创建	59
第三节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	69
本章小结	97
第二章 专业设置：高校类型与多民族文学分布	99
第一节 两种校园：一般院校与民族院校	100

第二节 专业教学中的语种配置与民族多元	134
本章小结	162
第三章 课程读本：多民族文学的课堂呈现	164
第一节 “两类教材”：文学史与文学作品选	164
第二节 “文学史”教材里的“中国”	190
第三节 文学人类学专业课程的三个读本	208
本章小结	216
第四章 师生实践：多民族文学教育的田野考察	217
第一节 高校文学教师访谈	218
第二节 高校文学专业学生问卷调查	244
本章小结	280
结 论	282
附录1 美国高校课堂里的中国多民族文学教育 ——以俄亥俄州立大学为个案的实证考察	288
附录2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部分著作列表	311
附录3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部分书目	313
附录4 《关于中国高校多民族文学教育情况的 问卷调查表》	315
参考文献	318
原博士论文后记	342
出版后记	346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学科背景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第一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在《万国公报》上登出了《求著时新小说启》。这则启事试图借助“感动人心，变异风俗”的小说改变彼时中国最为严重的三大积弊，即鸦片、时文与缠足。傅兰雅沉痛地指出“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①从这则启事来看，傅兰雅首推小说的原因，正在于小说能“劝化人心，知所改革，虽妇人孺子亦可观感而化”^②。傅兰雅对小说的此种认识，某种程度上与梁启超（1873—1929）先生不谋而合。梁启超将小说视为“文学之最上乘”，并强调“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③。

① 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万国公报》1895年第77期。

② 傅兰雅：《时新小说出案启》，《中西教会报》1896年第二卷第3期。

③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期。

也就是说,无论是外来的传教士,还是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都已然关注到文学在改良时弊与重塑新民方面的积极作用。

1896年,在傅兰雅对126部应征而来的“新小说”进行批阅之际,上海广学会编译出版了《中东战纪本末》一书。编者在书末附了一篇简短的《文学兴国策》。《文学兴国策》由日本思想家森有礼(Mori Arinori, 1847—1889)编著。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 1836—1907)将其翻译为中文。^①以“固日抱振兴中国之志者”自称的林乐知认为,对于有借法自强之志却又苦于无从下手的中国而言,若能效仿《文学兴国策》之为,必能“明愚昧之人心,而成富强之国势”^②。需要指出的是,此书中的“文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言的“文学艺术”,而是“文化教育”的旧译。^③也就是说,除了文学,文化教育亦受到复兴中国的仁人志士们的关注。

实际上,在经历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重创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耻辱后,清末士人在被迫接受新的世界图式之际,还面临着“救亡图存”路径的思量、选择与实践。彼时,“实业救国论”与“教育救国论”互相争持又彼此推动,“科学技术”成为二者最重要的连接,而“文学”则以“无用之用”成为近现代中国“复兴”与“救国”的又一途径。^④1949年以后,“文学教育”在当代“多民族中国”是否还能延续以往的“效用”呢?

① [日]森有礼编著:《文学兴国策》,[美]林乐知、任廷旭译,上海广学会1896年初版,上海书店出版社,“近代文献丛刊”之一,2002年印。

② 林乐知:《〈文学兴国策〉序》,《万国公报》1896年第88期。

③ 刘绪义:《一百年前的“文学兴国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12月号总第9期。参考网址:<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09038g.htm>。

④ 相关论述可参见:刘克敌《教育的使命与文学的使命——从〈文学兴国策〉说起》,《书屋》2005年第3期;李忠《近代中国“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互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7期。

一 选题缘起：文学教育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就文学的功用而言，孔子曾劝勉其弟子，诗不仅能“兴观群怨”，还具有“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特殊功用（《论语·阳货》）。若孔子侧重诗于人伦、教化和风俗层面的影响，那么，近代以来，欲以文学“救亡图存”的学人则将其视作重要的公共话语参与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运动。如陈独秀就曾指出，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而转移的。^①“文学革命军”大旗之所以要推翻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与山林文学，是因为其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的国民性互为因果。因而，陈独秀认为，要实现革新政治的目的，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②。主张“教育救国”的胡适则期望通过文学史的话语书写，以白话代替文言，以便造成一个举国合之的运动。^③胡适的理想与陈独秀早年强调“国语教育”能达“同国亲爱”的目的^④基本相同。此外，鲁迅在“幻灯片”事件后，亦企图以文艺启蒙改造“愚弱的国民”^⑤，以便“起我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⑥。上述学人的观点，是我们当下认识文学的社会作用时，必须正视的背景、起点与基础。

其实，并非内忧外患的近现代中国才重视文学在国民精神重塑与

① 参见陈独秀《亡国篇》，《安徽俗话报》1905年第19期；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②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1917）。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3页。

③ 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④ 参见陈独秀《国语教育》，《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3期；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4页。

⑤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439页。

⑥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关于鲁迅的文艺观，可参考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李怡、郑家建编著《鲁迅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民族国家复兴方面的意义。在当代中国,即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各民族国家”,亦时刻面临着如何继续加强其已经确立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①等问题。需要明确的是,当共产党创建了新的国家政体后,在其国土内所有民族进入这个统一政体的同时,他们的文学与文化亦一并被纳入新的体制话语之中。^②因而,这个新的共和国必然不会忽视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彼时“我国的各少数民族都处于正在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的阶段。艺术和文学在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共同心理这个特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③。的确,新中国成立以来便采用了一系列文艺措施及实践,以便体现宪法所强调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编写一部包括各个民族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强调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④,就是其系列举措之一。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学,期望通过文学艺术突破并超越“民族对立”的旧模式,维系并巩固“民族团结”的新局面,可以说是新的时代背景寄予文学的重任。只是,此夙愿却因“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以及长久以来的“大汉族主义”的影响未能全然实现。^⑤就与此相关的学校文学教育而言,马学良先生谈道:

我们生存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很多人不知跟我们生活在同一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实施。

② 关纪新:《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③ 参考费孝通与林耀华共同撰写的《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原文初载《人民日报》。本书引自《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④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参考资料》,1984年版,第1—2页。

⑤ 参见徐新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意义和前景》,《中外文化与文论》2013年第2期。

个国家中有些什么民族。不说一般人，就连有些大学生也不甚了了，更谈不上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了解了。大学文科的文学课程设置，不乏古今中外的文学课，唯独没有少数民族文学这类课程……因而有的少数民族学者为此啧有烦言，认为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既曰中国文学，就应当包括五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否则就改名汉族文学系。^①

马学良先生的这段话刊于苏联解体后一年，当时“民族问题”已引起国际关注。彼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如何应对经济开发所带来的东西部地区差异增大等问题。因而，上引文至少指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两种现状：一是国民对多民族中国国情的认知现状堪忧；二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的权利体现不够。此二者又相互关联、彼此影响。设若大学校园里的文学专业设置与具体教学尚未能符合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那么，本应在民族共同心理重塑与凝聚上发挥巨大作用的文学教育，则可能成为破坏民族团结的导火线。

时隔多年，上述境况得到了较大的转变。2010年，如何使高等院校的文学课堂实践符合多民族中国国情、包括56个民族的文学教育，在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得到了广泛的讨论。^②2011年，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1&ZD104，主持人：徐新建）立项，考虑到教育在多民族国家文学认知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文学教育：多民族文学的社会传递”被

^① 马学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序》，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编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② 吴刚：《第七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综述》，参考中国民族文学网网站：http://iel.cass.cn/news_show.asp?newsid=8429。

项目主持人徐新建教授设为子课题之一^①，由此将多民族中国的文学教育从民间学术论坛式的话语提升至国家主导的学术层面。子课题的设计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关注现代社会中学校式的文学教育，关注其中的文学理念、课程设置及其对受教育者身份认同与族群记忆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比存留在乡土民间的传统文学的传承，从文学生活的角度考察族群内外的文学表述和文化交流”^②。这样的设计意在整合国家主导的现代学校教育与乡土自在的传统文学传承，阐释彼此的并存及互补关联。

本研究即由上述子课题而来。考虑到博士论文研究与课题项目之间的差异以及个人田野调查的能力有限，本研究侧重于现代校园部分，并选取高等院校的多民族文学教育进行考察研究。乡土民间的口头文学传承则在其他子课题论述中展开。

二 理论背景：“大文学观”“民族志诗学”与“多元文化教育”

本研究的理论背景有两个维度：一是文学人类学学科的“大文学观”与美国民俗学界的“民族志诗学”。这两个理论都强调口头传统与活态文学，是对以往僵化的“文字中心主义”文学观的一种突破。二是西方多族群国家教育学界提出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这个理论对多民族中国的教育借鉴在于如何从教育内容方面将各个民族的文化纳入公共教育空间。本研究期望在国内学界与国外学界的互为观照中反思传统的文学观与文学教育，并对文学人类学的“大文学观”与“多元文化教育”作一梳理。

^① 参见徐新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意义和前景》，《中外文化与文论》2013年第2期。

^② 同上。

（一）文学人类学的“大文学观”与“民族志诗学”

1. 文学人类学的“大文学观”

文学人类学是20世纪在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下出现的一个跨学科领域。“文学人类学”即在文学专业方面以文化人类学视野看待、思考和研究文学的学问。^①有关文学人类学的研究与中国文学人类学科的发展，已有专著出版，如史忠义、户思社与叶舒宪主编的《国际文学人类学研究》、方克强的《文学人类学批评》、代云红的《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②等。近30年来，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动向为中国文学学界颠覆“文本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中原中心主义三大流弊”，“走向文学的文化语境还原性研究”^③提供了新范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人类学学者的代表性论述集中在三个方面^④：其一是对古代文学典籍的“人类学破译”以及从人类学角度对神话与历史的分析与阐释，以萧兵、臧克和、叶舒宪等为代表^⑤；其二是用原型理论分析中国作品，以方富强、叶舒宪等为代表^⑥；其三是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对文学与仪式、民歌与国学进行整

① 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定义，可参考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② 史忠义、户思社、叶舒宪主编：《国际文学人类学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方富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代云红：《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 乐黛云：《为中国文学研究开创历史新纪元》，《中外文化与文论》2013年第2期。

④ 徐新建教授对此也进行过相关讲述。他将其分为五类，本书归纳综合为三个方面。参见徐新建《当代学科的交叉与汇合》，参考上海交通大学网站：<http://www.sjtu.edu.cn/info/1493/26077.htm>。

⑤ 可参考王孝廉等《关于叶舒宪等“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的笔谈》，《海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叶舒宪主编《神话历史丛书》（第一辑四本），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⑥ 参见叶舒宪主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方富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合研究，以彭兆荣、徐新建为代表。^①这三方面研究关怀的是“文学的叙事‘文本’”以及“人类生命体认的‘本文’”^②，并试图构建出具有文学人类学特色的大文学观。

现代汉语里的“文学”由英文“literature”翻译而来。literature 一词在英文里的出现，可追溯至 14 世纪。彼时该词意为“通过阅读所得到的高雅知识”，其最早词源为拉丁文 littera，意指字母 letter。^③西方现代文学观将“文学”分为小说、诗歌、戏剧与散文四个领域，这样的文学观念移植入中国后，大量不依赖文字书写传统传承的民间口头说唱、史诗吟诵、仪式展演等文学样态根本无法纳入上述领域。因而，国内学界不少学者就此现状，从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等角度提出重新理解并反思文学观。如李亦园先生在《从文化看文学》中的讨论：

假如我们把“文学”的定义界定是要用文字书写出来的，那么世界上确实有许多民族是没有文学的。但是从人类学的立场看，文学的定义实在不能限定于用文字书写出来，而应该扩大范围包括用语言或行动表达出来的作品。这种用语言而不是文字表达出来的作品，一般称之为“口语文学”（oral literature）……口语文学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包括传说、神话和故事，以及歌谣、谚语、诗词、戏剧、谜语、咒语、绕口令等。^④

① 参见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徐新建《民歌与国学》，巴蜀书社 2008 年版。

② 彭兆荣：《文学人类学叙事的形式实体》，《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6 期。

③ [英]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268—274 页。

④ 李亦园：《从文化看文学》，叶舒宪编著《文化与文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 页。